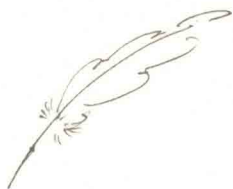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今丛编

刘小枫◎主编



刘小枫◎编

撒路斯特与政治史学

Sallustius and Political History

曾维术 等◎译

黄汉林◎校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撒路斯特与政治史学

Sallustius and Political History

刘小枫 | 编

曾维术 等 | 译

黄汉林 | 校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撒路斯特与政治史学/刘小枫主编;曾维术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0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6045-3

I. ①撒… II. ①刘… ②曾… III. ①撒路斯特—史学—思想评论
②历史事件—研究—古罗马 IV. ①K095.45 ②K545.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4185 号

撒路斯特与政治史学

刘小枫 主编

曾维术 等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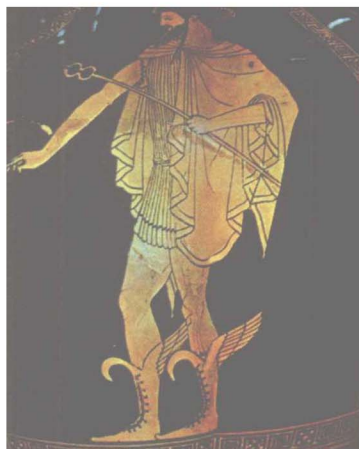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字 数:151 千字

印 张:6

定 价: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基督教与西方古典传统研究》
编号:10JJD730004

“古今丛编”出版说明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因应与西方政制相遇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我国学界诸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禀赋和志趣奋力迻译西学典籍,翻译大家辈出。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典籍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偶然性。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典籍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积淀,至80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尽管这套汉译名著的选题设计受到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迫切感到必须重新通盘考虑“西学名著”翻译清单,首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虽然从重新认识西学现代典籍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侈谈所谓西方文化,实际谈的仅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尤其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出现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并未涉及西方古学。对西方学术传统中所隐含的古今分裂或古今之争,我国学界迄今未予重视。中国学术传统不绝若线,“国学”与包含古今分裂的“西学”实不可对举,但“国学”与“西学”对举,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现代学术习性:凭据西方现代学术讨伐中国学术传统,无异于挥舞西

2 撒路斯特与政治史学

学断剑切割自家血脉。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问题的关键,于庚续清末以来我国学界理解西方传统的未竟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自 2003 年起步以来,迄今已出版二百余种,以历代大家或流派为纲目的子系初见规模。经重新调整,“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将以子系为基本格局进一步拓展,本丛编以标举西学古今之别为纲,为学界拓展西学研究视域尽绵薄之力。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甲组

2010 年 7 月

编者前言

在汉语学界,撒路斯特(C.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约86—约前35年[汉昭帝始元元年—汉元帝建昭四年],现代西语通常简称Sallust[Salluste],中译名亦简称“撒路斯特”)的名气远不如维吉尔。在西方文教界,撒路斯提乌斯的纪事作品却是比维吉尔的叙事诗更为普及的拉丁语文学经典读物。虽然早在撒路斯特之前,恩尼乌斯(Ennius,公元前239—前169)已经写过《编年纪事》(*Annales*),著名的老卡图也写过《史源》(*Origines*),可惜都未能流传下来;声名显赫的纪事作家珀律比俄斯(Polybios)和珀赛多尼奥斯(Poseidonios)与撒路斯特差不多同时代,但他们是希腊人,用希腊语写作;恺撒不仅是撒路斯特的前辈,也用拉丁语写作纪事,但他写的不是共和国纪事,而是征服蛮夷的经历……总之,撒路斯特是实际上的用拉丁语写作古罗马共和国纪事的第一位人。

古罗马的重要诗人和作家大多出生在乡下,并非土生土长的罗马人——著名诗人和作家中,唯有恺撒出生在罗马城。撒路斯提乌斯的出生地在萨宾(Sabin)地区的Amiternum小镇,位于如今意大利的Aquila附近:沿80号高速往西,绕过Gran Sasso就可到达撒路斯特故乡。撒路斯特出身骑士家庭,这种等级出身的子弟一般会被家长送到罗马城里去念书,日后寻求仕途上的发展。撒路斯特在罗马城获得的不仅是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也亲眼目睹了共和国晚期政坛的风云诡秘。政治派系相互倾轧,要在政治事功上有所作为,又必须进入派系……撒路斯特投身恺撒麾下,一说他英勇善战,后来晋升为方面军司令,统率多个军团四处征战,一

说他指挥打仗并不怎么样,无论如何,撒路斯提乌斯跟随恺撒后毕竟有了一段作战生涯。恺撒遇刺之后,撒路斯提乌斯失去了靠山,他自己则说对权势争斗心生厌倦,总之,这时撒路斯提乌斯决定退出政坛,专致写作共和国纪事——元老级别的政治家退休后有了闲暇才会写回忆录(比如著名的小卡图),撒路斯提乌斯并非如此,他把退修共和国纪事当成了自己真正的政治事业。

撒路斯提乌斯写下的第一部纪事即传世不衰的《喀提林阴谋》(*Catilinae coniuratio*,成于约公元前43—前42年间),记叙共和国晚期的一场著名未遂政变始末。事发当年(公元前63年),执政官西塞罗果断采取铁腕手段平息政变,因此而获得“共和国救星”的美誉。撒路斯提乌斯的纪事并没有以西塞罗与喀提林的较量为主线,甚至刻意淡化西塞罗的功绩,以至于从今天的史学观点来看,这部纪事很难算得上严格意义上的史书。然而,对于撒路斯提乌斯来说,纪事写作的目的不是收集“史料”,像如今我们的史学家喜欢说的那样,忠实、客观地记叙历史事件,而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文学性记叙探究共和政制的道德政治状况。如果我们用现代的实证史学原则来衡量撒路斯提乌斯,无异于矮子衡量高人——撒路斯提乌斯纪事写作的楷模是古希腊的纪事作家修昔底德,修昔底德的纪事并不符合如今的实证史学原则,如施特劳斯所说,只能称之为“政治史学”。撒路斯提乌斯的纪事写作与此一脉相承,当称之为古罗马的政治史学。“政治”这个语词的原始含义是“城邦”,在古罗马叫“共和国”,因此,“政治史学”总是与城邦或共和国的命运维系在一起,共和国史学必然就是“政治史学”。

政治史学预设自由和帝国是(这并非不合情理)人类的伟大目标——预设自由和帝国是令人羡慕的正当目标。自由和帝国引发许多庞大共同体最伟大的奋斗。这种伟大令人惊叹。这种伟大能为每个人所见或所感,而且正是这种伟大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政治史学的主题是重大的公众性主题。政治史

学要求这一重大的公众性主题唤起一种重大的公众性回应。政治史学属于一种许多人参与其中的政治生活。它属于一种共和式政治生活,属于城邦。^①

命运总是当下存在,并在冥冥中决定着被支配者的未来,已经过去的命运,就不再成其为命运。因此,政治史学以某个当前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个案,以文学性的纪事笔法来探究城邦或共和政制的基本难题,有如在与城邦或共和国的命运搏斗。修昔底德的《战争志》出自他亲身经历和目睹过的战事,《喀提林阴谋》记叙的是撒路斯特提乌斯自己在二十多年前所目睹的一次共和国危机——如莫米利亚诺所说,古希腊罗马史学都是“当代史”。^②

撒路斯特提乌斯写下的第二部传世之作是《朱古达战争》(*Bellum Iugurthinum*, 成于约公元前 41 - 前 40 年间), 记叙撒路斯特提乌斯出生前二十多年(公元前 111 - 前 105 年间[汉武帝元鼎六年 - 汉武帝元封六年])的朱古达战事, 有如我们记叙民国往事或新共和之初的战事。这部纪事同样不是实录性史书, 即便撒路斯特提乌斯随后写的多卷本《[共和]纪事》(*Historiae*, 五卷本), 采用编年体记叙苏拉死后(公元前 78 年)至喀提林政变前不久(公元前 67 年)的共和国史, 仍然不是实录性史书——可惜这部著作只留下残段, 仅四篇演说辞、两通书简较为完整(证明此书出自撒路斯特提乌斯手笔的是其中“致恺撒的信”和一首讽刺西塞罗的短诗)。可以看出, 以自己的从政经历为基础, 撒路斯特提乌斯的三部纪事实有内在关联:《喀提林阴谋》突出体现了对共和国晚期政治危机的关切,《朱古达战争》是《喀提林阴谋》的延伸,《共和纪事》恰好把《朱古达战争》与《喀提

① 施特劳斯,《修昔底德:政治史的意义》(彭磊译),见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华夏出版社 2011, 页 130。

② 参见 Arnaldo Momigliano,《传统与古典历史学家》,见《新史学》,1 (2003), 页 21。

林阴谋》连接起来,由此构成了共和国晚期政治史系列。

大约在我国秦汉之际,经过与西面迦太基的3次战争(公元前264[周赧王五十一年]-前146年)和与东面马其顿的3次战争(公元前214[秦始皇三十三年]-前167年),罗马共和国崛起为地中海地区大国。罗马人把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世纪视为共和国史的巅峰时期:在连续不断的战争中,古罗马共和国的“先烈”们锻造了共和国的 *virtus*[德性]。然而,一个政治共同体难有永久的繁荣和稳定,一百多年后,在今人看来近乎完美的共和政制已然深陷权力阶层的腐败和倾轧不能自拔。古罗马共和国晚期堪称典型的政制危难时代,形形色色的政治动乱为生逢其时的撒路斯特乌斯提供了丰富的思考政治的材料:童年时期,他遇上第一次共和国内战(公元前82-前79年),青年时期遇上西班牙地区的瑟托留(Sertorius)起义(公元前80-前72年)和斯巴达克斯(Spartacus)领导的奴隶暴动(公元前73-前71),成年后先目睹庞培(Pompeius)剿灭海盗之战和征讨东部地区的米忒里达特(Mithridates)之战(公元前67-前63年),随后又目睹罗马城里的喀提林政变(公元前63年)。恺撒平定高卢动乱期间(公元前58-前51年),撒路斯特乌斯跟随恺撒,实际上参与了庞培与恺撒之间的第二次共和国内战(公元前49-前45年)。恺撒遇刺(公元前44年)后,撒路斯特乌斯又经历了第三次共和国内战:谋杀恺撒的一派与渥大维(Octavianus)和安东尼乌斯(Antonius)为争夺权力相互厮杀。

尽管政治阅历极为丰富,亲历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撒路斯特乌斯最初的两部纪事分别选取的是国内政变和对外战争,似乎一个涉及内政、一个涉及“国际关系”——其实不然。在陈述自己写作《朱古达战争》的意图时,撒路斯特乌斯明确提到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参见《朱古达战争》,5),表明《朱古达战争》实际上仍然涉及的是内政:《喀提林阴谋》揭示了共和国政治高层的腐败与政变的关系,《朱古达战争》揭示了共和国军事高层的腐败与战事的关系——两书关注的都是共和国领导阶层的道德品质问题。撒路斯

提乌斯的两部纪事让人们看到:优良的政制首先取决于领导阶层的德性品质,共和国领导阶层的品德败坏必将断送共和政制。反过来说,共和政制再完美,如果领导阶层品德败坏,共和政制必然会衰败。如今的实证史学原则要求史家关注的是各种人世力量与事件过程的复杂交织,找出历史事件的形成过程和演变方向。古典的政治史学并非不在乎这些所谓历史事件的要素,然而,古典史家的确更看重历史事件的道德-政治含义,这就必须探究政治事件中各色重大行为的善恶、对错、优劣,探究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和灵魂品格,而非仅仅描述事件过程或权力冲突本身,把心思和精力全放在挖掘材料上,孜孜以求还原历史真面目。古典纪事的目的是政治教育,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涉及人的行为的纪事”,有益于人们“了解政治事务”(《修辞术》1360a36)。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不会自动教育人,为了教育(docere)政治人,纪事作家需要用自己的纪事笔法“抓住”(delectare)人、“感动”(movere)人。因此,纪事本质上属于文学作品——用西塞罗的说法,属于“演说性质的作品”(opus oratorium,《论法律》,卷一,5)。可以说,政治史学必然带有道德政治立场,而非像现代实证史学那样,高标所谓史学的客观中立性——事实上,实证史学能否真正做到道德政治立场的中立,仍然未能摆脱质疑。倘若如此,我们就值得关注,撒路斯提乌斯从哪里获得纪事写作的道德政治立场。

只有政治成为重要之事,政治史学才将成为重要之事。只有政治成为至关重要之事,政治史学才将达到其顶峰,才将成为至关重要之事。然而,仅仅对于那些更想拯救其城邦而非其灵魂的人们(如某些佛罗伦萨人那样),亦即对于那些受共和式德性精神、城邦精神所支配的人们,政治才是至关重要之事。可是,受城邦精神支配的人将无法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政治史家。一位古代评论家说,政治史家必定是邦外之人,是无邦之人,是超越城邦之人。政治史家必定不仅仅是个公民,甚至不

仅仅是个治邦者：他必定是个智慧之人。政治史预设，智慧之人认为，对于悉心而同情地描述政治生活而言，政治生活本身相当重要；而这个预设包含着一个悖论。智慧之人始终会倾向于轻视政治生活，轻视其喧闹扰攘与绚丽荣耀。（施特劳斯，《修昔底德：政治史的意义》，前揭，页130）

施特劳斯关于“政治史学”的这段说法连续用了两个转折连词，意在突显政治成为“至关重要之事”的两种可能情形。第一种情形表明，政治之所以“至关重要”，乃因为对有的人来说，拯救城邦或共和国比拯救自己的灵魂更重要——括号中的“某些佛罗伦萨人”会让我们想起《佛罗伦萨史》的作者，正是这位“史家”开创了实证史学的先河。第二种情形表明，真正的政治史家当是首先关心灵魂正义的智慧之人，这种人的生活旨趣本来“超越城邦”、超越政治、超越共和国的利益。对这种人来说，政治之所以变得“至关重要”，乃因为他毕竟仍然是城邦中人，毕竟是共和国公民。在这种政治史家那里，政治与超越政治的灵魂问题必然勾连在一起，因为他必然关切灵魂的政治处境。

《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开篇说的都是人的灵魂品级，读起来像是哲学论著的开头，而非史书的开头，表明撒路斯特模仿的是后一类政治史家。撒路斯特熟悉古希腊的哲学和纪事作品，熟悉古希腊修辞术传统——古典语文学家经过细致的文本研究查明，撒路斯特的纪事有明显模仿柏拉图、修昔底得、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德摩斯忒涅（Demosthenes）甚至廊下派作家珀赛多尼俄斯（Poseidonios）的痕迹，并且断定，他的写作楷模主要是柏拉图，这无异于说，柏拉图是政治史学的教师。柏拉图是古希腊的大哲人，如果撒路斯特的纪事写作模仿柏拉图，我们就可以说，撒路斯特也是个哲人。但翻开如今的哲学史书，我们在古罗马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数不出几个哲人。在如今的哲学系念书，我们也不会遇到撒路斯特……因为，近代以来、尤其自普及康德哲

学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仅仅把思考形而上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人视为哲人,仅仅把抽象的思辨言述视为哲学。有了这种虽不成文却影响广泛的哲学偏见,我们把西方思想史上好些伟大哲人逐出哲人之列,也就不奇怪了。可是,即便带有这样的偏见我们也可以看到,柏拉图的作品并非抽象的思辨言述,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苏格拉底并非整天在沉思形而上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我们显然不能说柏拉图不是伟大的哲人。事实上,柏拉图通过自己的苏格拉底纪事区分了两类哲人——自然哲人和政治哲人,前者好沉思出世间的理则,后者关切世间的善恶、好坏、对错、美丑、贵贱,因此政治成为“至关重要之事”。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亲身经历过从自然哲人到政治哲人的转变,而且多次陈述过自己如此转向的理由。关切人事的政治哲学,最切实的言述样式当是纪事——无论诗体还是散文体。柏拉图学述基于苏格拉底纪事,采用夹杂叙事的戏剧体,但总体而言,柏拉图的哲学言述明显具有纪事性质:记叙苏格拉底这个真实历史人物的言行——苏格拉底某天在某处与某人(或某些人)谈论某个政治哲学问题。

一旦摆脱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影响让我们养成的盲目偏见,我们就可以恢复关于哲学的整全视野,看到撒路斯提乌斯的确堪称政治哲人。政治哲人与自己的政治共同体具有紧密的生存性关联,撒路斯提乌斯与共和国传统的关系,一如苏格拉底与雅典政制传统的关系。如果说撒路斯提乌斯的纪事写作从柏拉图那里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立场,那么,他的道德政治立场就来自古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伦理 *Exemplum* [典范] 老卡图 (Marcus Porcius Cato, 公元前 234 - 前 149 年)。这个人生活在古罗马共和国崛起的激荡人心的年代,在实际政治中以立场强硬著称,积极支持第三次对布匿人开战,明确提出罗马人的政治目标是要消灭迦太基这个地中海地区与罗马对峙的政权——他的名言是: *Ceterum 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 [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毁灭] (后来变成简洁的传世格言: *Carthāgō delenda est*)。在出任监察官期间,老卡图严格要

求执政官员必须具有道德风范,以至于后来人们干脆叫他 *Cēnsōrius* [(共和国的)监察官]。对于共和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老卡图具有明确的自觉意识,他反对盲目崇拜古希腊文明,主张以罗马人自己 *mōs māiōrum* [祖先的习规] 型塑共和国文明。老卡图不仅用拉丁语写下《史源》(*Origines*),还写过一本农事书,毕竟,罗马人祖祖辈辈生活凭靠的是黄土地,而非像希腊人那样凭靠蓝色的海洋。老卡图并非如今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他并不排斥古希腊文明的具体成就——将希腊人恩尼乌斯带回罗马的正是老卡图,他自己到老年还学希腊语,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古希腊修辞术的痕迹。老卡图在共和国史上德高望重,几乎成了共和国政治伦理的化身,撒路斯提乌斯以他为道德政治楷模,并不奇怪。古罗马帝国时期的纪事家苏维托尼乌斯说他不过“拾卡图牙慧”,反倒足以证明,就恪守共和国政治伦理传统而言,撒路斯提乌斯与老卡图一脉相承。

与修昔底德一样,撒路斯提乌斯是从战场上走来的纪事作家,这样的古希腊罗马纪事作家还可以举出色诺芬、珀律比俄斯、恺撒。我国古代鲜见这类政治纪事,撒路斯提乌斯的两部纪事篇幅较短(尤其《喀提林阴谋》),如果要体会古希腊—罗马政治史学与我国传统史学的品格差异,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是难得的范本。还应该提到的是,在撒路斯提乌斯时代,古典拉丁语尚未定型,仍在形成过程中。语文是文明的标志,有语言不等于有语文,语文得凭靠高贵灵魂的书写。撒路斯提乌斯的纪事作品为拉丁语文的精致和规范化做出的贡献,深得后世拉丁语诗人和作家(如贺拉斯、塞涅卡)赞誉和感激。尼采盛赞塔西陀的文风,塔西托则盛赞撒路斯提乌斯,称他为奥古斯都之后最了不起的纪事作家。基督教大作家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称赞撒路斯特是 *nobilitatae veritatis historicus* [高贵而又信实的纪事家](1.5),不过想用他的作品来证明,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共和国的衰亡一样,是自身腐败咎由自取,不能嫁祸于基督教。也许由于奥古斯丁的赞誉,即便在基督教的中世纪,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仍然受到重视。文艺复兴以后,撒路斯提乌斯的两部

纪事自然成了学习古典拉丁语的典范教本,迄今如此。尽管好用日常俗语,撒路斯提乌斯的文风总体而言庄严、高贵,善于化用古希腊作家的修辞技法(对比语式、省略连词的松散连接、句子成分的交错配列)来搭建拉丁语句,避免呆板的文句和过长的从句,句型多姿,选词出奇,让读者保持清新的阅读感觉,似乎刻意与西塞罗的繁复文风形成鲜明对比。阅读撒路斯提乌斯纪事的拉丁语原文,的确可以感受到干净利落的语文魅力。

十多年前,撒路斯提乌斯的两部传世作品已译成中文(王以铸、催妙因译,《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由于缺乏必要的文本解读和笺释,我们阅读起来难免有不少困难。西方学界的撒路斯提乌斯研究迄今新作不断,本编选译的四篇论文——或透析撒路斯提乌斯的修辞,或探究撒路斯提乌斯与修昔底德、悲剧诗人以及柏拉图的关系,当会有助于我们自己的研读。

刘小枫

2011年元月

于重庆枇杷山

目 录

编者前言(刘小枫) / 1

巴特斯通 德性对照:对比修辞与共和国晚期的危机 / 1

凯 特 尔 修昔底德与撒路斯特 / 51

杜 伊 悲剧的历史与《朱古达战争》中蛮王的演说 / 65

麦克奎因 撒路斯特政治纪事中的《王制》 / 86